## 动态书评

# 从思想史到思想家的历史
## ——评麦哲维《学海：十九世纪广州的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程美宝

《学海：十九世纪广州的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认同》①一书，是美国中国研究学者麦哲维历经十数载完成的力作。作者在前言中说，他希望自己无负乃师所望，写出一部思想家的历史（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而非仅仅是一部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读毕此书，笔者认为作者不但已经实现了其导师的期望，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讨论，很可能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原来预设的范畴和深度。

《学海》一书，以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建立的学海堂为中心，考察了19世纪聚集在广东省城和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精英在家庭背景、治学途径、事业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面相，由此牵扯出众多历史人物的浮沉升降，并在这历史场景下重现他们的自我表述，这就是此书副题的两个关键词——“社会流动性”和“身份认同”的关怀所在。围绕着这些关怀，作者除了钻研时人的经学著作外，还利用大量地方文献，将其所要研究的“思想家”置于一个具体的地域和社会情境中来讨论。也因为如此，作者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其学术取向也从传统意义的思想史延伸到地方社会文化史。尽管此研究扎根在一时一地的历史场景，但正如作者所说，只要我们追随着历史人物的足迹，就会发现当中所呈现的许多历史现象，都须从跨地域的视角观照方能得到理解。

全书除导言外，共分八章，大致按时序排列。首章为“都会气象与自成一隅：省城与珠江三角洲腹地”。作者在本章描述了嘉道年间广州的文人社会，在这里，汇聚了一批在省城定居不过三、四代，主要来自江南和福建地区的文化和商业精英，加上从粤东嘉应地区移居省城的操客家方言的文人，日后成为兴办学海堂的主力。与这些家庭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分布在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大族，自明清以来，通过围垦造田及对其他资源的掌控，这些以宗族形式组织的群体，成为珠江三角洲强大的政治势力，自清中叶以降，人工围垦而形成的新生的沙田的迅速增长，给新兴宗族集团带来巨大的财富。这些大族的成员由于经济势力雄厚，往往有不少取得科举功名，其文化、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更容易通过结盟、姻亲，以及其他手段诸如撰作出版和在省城建立书院而更加巩固。较诸来自外地定居广州的行商家庭难以渗入珠三角腹地而言，这些珠三角大族要在广州立足则相对容易，他们和行商的捐献，后来成为学海堂经费的主要来源。作者在这一章中，一方面刻意对照省城和珠江三角洲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不忘提醒我们，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各种联系。不过，在这里作者似乎可以更明晰地指出的是，清代在省城建立的大量“书院”，其实是分布在广东各地的宗族在省城设立的宗

[收稿日期] 2006-12-10
[作者简介] 程美宝（1964-），女，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祠，这些以“合族祠”形式大量出现在省城的建筑，实质上是乡村大族在省城活动，并藉以联系其成员的办事处。黄海妍博士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她即将出版的有关广州合族祠的专著，也许有助作者深化其有关省城与四乡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全书虽着重研究一个学术群体，但作者也在很多地方尝试以一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一个群体甚或一个时代。在第二章“谢兰生的城市：1810 - 30年间广州文化精英的社交行踪”中，作者运用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谢兰生（1760 - 1831）手稿——《常惺惺斋日记》，讲述学海堂建立之前省城文化精英的活动。作者之所以以谢兰生为一章的主要论述对象，除了因为这份手稿揭示的细节十分难得之外，也因为曾担任粤秀和越华书院院长的谢兰生，是既有参与学海堂的建立，但又并非学海堂中人的“前学海堂”时期的省城学人的佼佼者。从其日记所见，谢兰生经常往来于寺院和富商庭院的文人雅集，当中不乏行商及其子弟的参与。尽管文人轻商的现象偶然还会在个别的事件中出现，但总的来说，时至19世纪，商人的生活空间已逐渐成为文人的聚脚点。作者这个观察，与近年中外有关明清城镇中商人与文人的关系，文人文化商品化的趋势的研究，有许多共鸣之处。作者还指出，在以治程朱理学为主流的“前学海堂”时期，在几家以科举考试为中心设立的书院中，已经出现过一些重考据之学的学者，当时广州省城还出现了一些文会或诗会，显示出本地文人中年青一辈的兴起。作者在这章企图证明的是，在阮元到任大张旗鼓地兴办学海堂的前夕，广州并非一个文化真空，省城的文化和商业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学海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三章，主要论述道光年间学海堂的建立过程，及其在咸同年间内忧外患之际的兴衰起落。第三章“省城新地标：建造学海堂（1820 - 1830）”首先谈到的是阮元抵达广州后，在突出崇尚考据的同时，也展示了他包容和多元的学术取向，为日后学海堂以至省城学界的“汉宋调和”的趋势埋下伏笔。关于这一点，过去研究学海堂的学者已经有所论及，但作者提醒读者的是，无论学海堂如何包容程朱之学，其每年庆贺诞辰的对象只有两人——阮元和汉儒郑玄，其最核心的学术主张还是明显不过的。此外，阮元也考虑到广州士子在赋诗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因而在诗文创作方面鼓吹得比较着力，这在历次编辑出版的《学海堂集》皆有所体现。作者在随后的一章亦提到，这些诗赋不但成为学海堂人咏赞本地事物的文体，更或多或少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考证功力。作者受到蔡鸿生教授在某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启发，也注意到尽管阮元对广东学人的诗作颇为欣赏，但实质上他对广东的学术和文学传统并不真心折服——当学海堂人醉心咏颂岭南荔枝时，阮元却独赞杨桃更是清妙！

由第一章有关省城定居形态的分析出发，作者在第三章指出，积极参加学海堂的活动以及后来获选任学海堂学长的学者，大多是新近移居省城且在珠三角腹地无甚根基的“外来人”。作者认为，学海堂的成员组合堪称是省城都会气象的缩影，却绝对代表不了广东一省甚至珠三角的人文景观。学海堂的选址最终定在越秀山麓，远离喧闹的商业地段或奢华的行商寓所，占了一个昂然独立、傲视同侪的位置，广州士子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聚脚点，他们自身的文化社会地位，也仿佛得以同步提升。通过论述、考试和出版，学海堂人声称他们所治的是“今之学”，所秉承的是来自江南的考据学风，既有别于自明代以来广东流行的理学传统，也有别于主要为应考科举而在省城设立的其他书院的宗旨。“学海堂同人”或“学海堂诸人”成为新一代省城学人的自我标签。他们建立起一套与时风有异的话语（discourse of difference）来突出自己，亦由此编织起他们所认同的“师承”和“家法”的系谱。

然而，身居广州的学海堂人也不甘于单向地接受来自江南的学术传统，他们很快就灵巧地用上考据方法，重写本地的历史。这就是该书第四章“重塑文化景观：历史、诗词、文集”的主旨。麦哲维首先指出，从道光年间至清末，学海堂人一直积极主持或参与编修广东各地的方志，为本地历史的撰著作出贡献。他进而以学海堂学长吴兰修和梁廷枏编修与南汉有关的史地和金石著作为例，展示学海堂人

如何运用严谨的考证方法，实地考察相关的金石碑刻，实践阮元的治学主张。作者追溯了自宋以来寥寥可数的几种有关南汉的历史著作，指出除了北宋胡宾王著《刘氏兴亡录》(至清代已佚)外，几乎所有关于五代十国的历史都是北方人撰写的，一直到清初才有杭州人吴任臣著《十国春秋》，以及一些广东学人如屈大均等在其著作中稍稍提及南汉的历史。因此，吴兰修和梁廷枏之编修南汉史，实际上是在追溯更早的、属于广东自己的"朝代史"，开创了写作地方史的另一种可能性。麦氏对道光年间本地学人格外注重治本地史的现象敏感是十分合理的，不过，他特别点出吴兰修在撰写《南汉记》等书时，用的是南汉的年号而非宋代学者认为属"正统"的五代年号，但又不称南汉的君主为"帝"而只以"汉主"称之，似乎是认为吴兰修这种做法表达了某种认同的倾向(第 132 页)。如果作者真有此意，似乎忽略了中国史书撰著有"年号与正朔自不相关"的惯例(顾炎武：《日知录》卷 21，《年号当从史书》)。吴兰修撰"南汉史"用南汉纪年，并不意味着他要刻意地与宋人奉五代为正朔的历史著作持不同的立场，正如奉周天子为正统的孔子撰《春秋》，也是用鲁国甚至其他诸侯国的纪年。

在此章的第三部分，作者仔细地比较了顺德罗学鹏从 1805年开始筹备编辑，在他逝世后于同治年间才部分出版的《广东文献》，以及学海堂学长谭莹在行商伍崇曜支持下从 1831至 1863年间陆续编辑出版的《岭南遗书》，尝试解说这两套文集如何展示出两种不同的"广东学术史"。作者认为，罗学鹏宣称以"理学"的传统，"高风""直介"的人格，作为其选取历代作者的共同准绳，其《广东文献》企图呈现的是一部整体而有机的从唐迄清的广东学术史。作者还注意到，在罗去世后四十多年再版的《广东文献》初集的标题页上，不但详细罗列名家，还在页眉处加上"岭南第一流人物"的字样以作招徕，似乎要面向的是一个更普及的读者群。相形之下，谭莹主编的《岭南遗书》，面对的只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学术群体，但其选材却甚具现实意义。借靠伍氏的家藏以及谭莹和其他学海堂人汇集起来的资源，《岭南遗书》更着重收入一些孤本和珍本，甚至企图重建一些失佚的文献，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岭南遗书》呈现的广东学术史，可以直追至汉代。为了与阮元鼓吹的考据学风相配合，《岭南遗书》的侧重点也从过去的文集主要集中在对作者的选取上，转移为对个别文献的刻意选取和考证上去。

前人研究学海堂，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始创阶段。作者在第五章"危机与重建中的学海堂、省城和珠江三角洲(1830 - 1870)"中，除了详细铺陈学海堂在咸同年间的发展情况外，更企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带给读者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另一番认识。作者指出，在这个一般通史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中央政府呈现的也许不过是回光返照，但各地的地方精英却在这个时候，通过重新整合资源，建立新型的地方管理机构，大大增强他们在地方上的威信和治理能力，此时的学海堂人和珠三角腹地的精英也不例外。学海堂学长更像精明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他们购买沙田，收取租金利息，并以这些收入重修山堂，重印文集和省志，重新恢复学海堂特有的"专课"制度。此外，为商人子弟而设的应元书院也在这个时候建立，学海堂人也因为已经具备一定的学术地位而获邀参与主持这类新的学术机构。在盐运使监督下建立的菊坡精舍，便是由学海堂学长陈澧主持的，陈澧在菊坡精舍也把学海堂专课生的模式加以发扬光大。麦氏指出，在同治年间，学海堂与菊坡书院、应元书院在越秀山上鼎足而立，俨然形成一个学术集团(academic complex)。学海堂和其他书院并非不吃人间烟火的"纯学术"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它也需要经营，它也会给经营者和参与者赚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第六、七章分别以同光年间广东两个最有名的学者——陈澧和朱次琦为中心，比较学海堂人与非学海堂人之异同，为了对比二人的分别，这两章分别命名为"我本江南客：陈澧与广州的汉宋调和之风"和"朱'九江'：另类认同与珠三角学人对省城的批判"。在第六章中，作者利用陈澧的自述和经学著作，理解其身份认同和治学方向。祖辈来自江南的陈澧，虽入籍番禺，在某些情况下也以广州人自

居，但通过多次回江南故里省墓，修纂宗谱，两次到扬州探访阮元，与其他江南学者通信等活动，企图重建他的江南之根（recreate his Jiangnan roots）。较诸广东而言，“江南”象征的文化气息，也成为陈澧强化自身的学术地位的某种资本。就学术发展方面而言，人到中年的陈澧，在自信已经掌握考据的同时，开始强调追寻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所谓“调和汉宋”的取向。作者指出，这种学术主张绝非陈澧独有，而陈澧在许多方面也不认同宋儒和明儒的学说，他及其同侪真正追求的，不过是通过证明朱熹也讲考据，汉儒也谈义理，来达致汉宋调和的理想。

与陈澧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朱次琦。在广东学术史上，朱次琦与陈澧齐名，但他也以不肯就学海堂学长之职，刻意与学海堂划清界限而自成一格。由于朱次琦在去世当年知道自己难以在生前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著作，把书稿尽行烧毁，其留世的著作不多，但作者灵巧地运用了朱次琦为其宗族编纂的《朱氏传芳集》和一些零碎的材料，向读者展示朱氏所处的南海九江乡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如何支撑起朱次琦自立门户。其实，就经学研究取向来说，朱次琦和陈澧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但朱对于学海堂制度化的考据学训练以至省城的学风，却因为置身于学海堂之外而能够作出更直接的批评。陈澧谓自己是“我本江南客”，朱次琦则选择了“朱九江”这个身份，并且通过编纂宗谱和《九江儒林乡志》，进一步扎稳他个人以及他所认同的地方独立于省会的文化地位。作者在这一章的结尾，辩证地总结了朱次琦自身作为一个文人与其所构织的文本的关系——编印书籍，让九江朱氏传芳百世；焚毁书稿，让“朱九江”自己千古留名。

在总结一章，作者并没有干巴巴地作一番学理的论述，而是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一个几代人皆与学海堂关系密切的汪氏家族的经历为纬，映照学海堂在19、20世纪之交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与贯穿全书的若干主题互相呼应。来自山阴的汪氏，数代寓居广州，皆以幕友为业，在广州这个省会城市里，他们藉着成为学海堂的学生，参加学海堂的考试和其他社交活动，得以晋身更高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确立了自己的精英身份，也缔造了一种广州人的认同。然而，到了20世纪初，汪氏成员因为政治和社会形势不同，对自身的前途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曾经是学海堂专课生的汪兆镛以遗民自居，其弟弟汪兆铭则投身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学海堂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者强调，在这个意义上，学海堂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机构，它更像中华帝国晚期位于都会城市的其他机构如寺庙、祠堂般，为流寓省城的移民群体提供一个社会流动的机会。这种外来移民在“成为广州人”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一种“本地意识”和“地方能动性”（local activism）。为了与相关的研究对话（如Peter Bol和Robert Hymes等人的研究），作者用了一个近年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常用的语词——“localist turns”（地方性转向）以概括之。他认为，广州和珠三角腹地的情况和其他学者在其他地方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尽管广州和珠三角腹地不像某些地方早在南宋就出现“地方性转向”，但在中、晚明时期以及19世纪前期和中期，这种转向却是显然易见的。

作者由此进一步发挥，认为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出现的“地方性转向”，在在显示出“地方认同”这个概念的灵活性。他的研究显示，缺乏地方根基的外来移民，借靠一个立足于省会的具有跨地域意义的学术机构，建立他们自己所认同的“本地人”身份，而这种本地认同的表述，及其背后的资源，又有别于扎根在珠三角腹地的“本地人”所能运用者。纵观全书，作者不论从个人的经历与认同、文献的编纂与刊刻，还是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入手，无不涉及“地方性”这个话题，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作者原来博士论文的标题“Local Matters”比起现在的书名“The Sea of Learning”来得更切题和有力。“Local Matters”语带双关——“本地之事，本地攸关”。更准确但略嫌累赘的表述则是：本地之事物备受关注（“local”作形容词用，“matters”作名词用），“本地”这个意识也变得关系重大（“local”作名词用，“matters”作动词用）。作者从文本、建筑等物质性的事物入手，也尽量通过阅读文献探讨时人的意识和感受，其研究本身就已经充分发挥了“matters”的双关义。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关怀并不囿于

“本地 ”,他研究的人物既在活动和意识上跨越本地,他讨论的议题亦与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鸦片战争、同治中兴、辛亥革命等互相映照。如果读者因为其书以“本地 ”和“广州 ”为题而觉得其研究“偏于一隅 ”,有失“代表性 ”的话,则不仅误读了麦氏一著,更漠视了华南地区的历史进程与许多中国历史重要转变环节的内在关联,亦忽略了地方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本地舞台上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也不明白区域研究对于了解国家作为行政管治、礼仪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机器与地方社会的组织和个人活动关系的意义。如果是这样,该更换的也许是读者的眼镜,而不是要作者放弃原来的书名。

较诸许多西方学者而言,作者对中国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可说是相当熟悉。不过,在个别的论述中,作者仍不免触犯一个常见的通病 ——某些事实和见解,在中文世界已有相当成熟的研究,甚至已经是常识,而作者却要引用某些英文著作,并认为是该作者的发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第 43页谈到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形成时,说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Robert Marks(马立博)指出三角洲大部分是人工造成的,这种做法起源于宋代,当时,种植水稻的技术从江南地区被引进到珠三角。通过控制水利,灌溉和人工填海等技术,三水、新会、南海和番禺南部等县原来许多岛屿和沙洲,逐渐转化成‘围田’。”马立博这番陈述本身可商榷之处姑且不论,即便其提及的事实,在许多今人的研究甚至清人的笔记中亦早已详论。作者虽然也有参考其他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但把这些在中国乃至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早已清楚揭示的事实,说成是马立博所“指出 ”(points out)的,则未免有失公允。

另外一个值得商榷的小问题,是作者对英文“Hakkas ”(客家)一词的运用。在第一章谈到寓居省城的文人时,作者提到其中一个也可以称为“外来人 ”的群体 ——来自嘉应州的士子。在相关的讨论中(第 36页),作者用了比较本质性的客观陈述句来介绍这个群体:“嘉应州的人口大部分由客家组成,一个在与在珠江三角洲定居的汉人在文化方面有很多不同的亚族群。”(The population of Jiaying was largely composed of Hakkas, a subethnic group in many ways culturally distinct from the Han Chinese who inhabited the delta.)在这里,作者引用的是梁肇庭的研究,不过,我们从梁肇庭的研究得到的启发是,居住在粤东地区操被统称为客家方言的语言的人群,在 18 - 19世纪之交的时候,其“客家认同 ”尚在形成之中,到了后来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客家身份的时候,他们也格外强调自己的汉人身份。我们甚至可以揣测,来自嘉应的学海堂学长吴兰修,不一定有“客家人 ”这种意识。作者在全书的其他论述,对于研究者的陈述和当事人的意识与表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会予以严格区分,但在讨论 18 - 19世纪来自嘉应州的士子这个问题上,在使用“客家 ”、“汉人 ”和“亚族群 ”等几个关键词时,则稍嫌轻率。

总的来说,全书主题鲜明,行文流畅,章节结构合理,图像运用得宜。每章皆以时人诗句开头,不但达致情理交融,亦彰显了作者翻译的功力。在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也是作者研究对象的追求的写照 ——调和汉宋,立足地方。作者的西方汉学训练基础厚实,能够谨慎比勘文献,翻译引文时相当注意一词一字的选用;与此同时,作者也不忘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史课题和中国历史研究独有的课题带进讨论,处处表现出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可谓融义理于考据之中。作者既饱览时人的经学著作,又着重钻研各种地方文献;既熟悉西方学界较前沿的讨论,又与中国学界的同行紧密联系,近年更沿江西进,到广西各地寻觅民间文献,可谓打通内外,贯穿中西,既独守书斋,也涉足田野。作者在治学和行文所作出的种种尝试,使他这部作品既体现了西方学术著作的语理论辩逻辑,也渗透出中国文史写作铺陈史实间或透露禅机的某种风味。细品麦氏此著,应该可以改变国内读者以为西方中国研究只强于“理论 ”的刻板印象。

①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 - 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VIII, 450 pp.